

陆景与《典语》

□ 谷文国 刘晓霞

《典语》是三国之际吴人陆景所撰，著作时间不详，最迟当不晚于吴天纪四年（280年）。是年，陆景遇害，年仅31岁。此书有感于东吴末年内忧外患的背景而作，针砭时弊，言无虚物，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然世已久佚，赖唐初魏征等人所编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内容既反映了陆景救弊于一时的殷切考虑，也逐渐凝练为一种治道主张，至今犹有可资取用的借鉴价值。

（一）

陆景，字士仁，出身吴郡陆氏，为江东大族，乃吴国名将陆抗之子、陆逊之孙。其弟陆机、陆云并称二陆，皆善属文作诗，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据《三国志·陆逊传》所载，陆景在其父死后领兵拜偏将军、中下督，后为王濬副军所杀。史传陆景“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然篇目无存。详考史料，其中当即有《典语》一书。关于此书，世人罕有所知，由魏征“总知其务”的《隋书·经籍志》曾有著录，此时距陆景的年代已有300余年，湮没久矣。魏征将此书归于子部，属“儒者”一类，谓“《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亡”。《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有“《典训》十卷，陆景撰”，列于儒家。揆诸史实，《典语别》当是魏征所谓“亡”者，而《典训》则是《典语》之误，唐以后即失传。宋明诸儒，无一言及，可见其亡佚之久。《群书治要》一书由魏征、萧德言等人编撰于贞观初年，唐末亡佚，赖由日本遣唐使得以传世，迟至清代嘉庆年间才再次重返中土，保存了大量后世未见的唐前珍贵典籍，《典语》即是其中之一。《典语》因为《群书治要》收录之故，直至清末方才重见天日，为学者所详知。《典语》在《群书治要》中被归于子部，与《隋书》的安排一致，其初衷即在于此。

《群书治要》选录《典语》是目前所能见到此书的最全内容，皆与吴国当时的政治情势相关，是陆景治道思想的集中展示。从其标目可知其主旨亦皆与《群书治要》相契合，体现了传统儒家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可惜当时吴主昏庸无能，内外交困，旋即为晋所灭，此书亦随之湮没无闻。

（二）

治道是传统儒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重要理念，代表了儒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追求和理想，先儒论述多有所及。治道有清、浊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才。陆景认为要想实现治道清明，就必须敬贤诛恶，使贤愚各别，这既是圣明王统御六合、治理群生所必须担负的责任，同时也是现实中选官用人的内在理性要求。在陆景看来，世间治乱与国家

安危，系于官人的选任，故而王者得人用人，不可不慎，其关键在于“敬贤而诛恶”。具体言之，“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昔日大舜举用八元、八恺之贤才，流放四凶之恶人，取得了垂拱而天下治的效果，冠德百王、光炎后世，其根本就在于所任得其人。可以说，贤人在位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感乱作，君道、臣职都要以此为重。

历史地看，天下广大，事务繁多，绝非一人所能董理，因而也必须通过分官别职，使人各守其位。然事有大小，人有优劣，所以官有尊卑、爵有等级，必须量才而用，任贤去恶。果能如此，则天下虽广必能治理，事务虽繁亦可解决。在陆景看来，在其位就必然要担负相应的职责，任其职同样必须知晓其职守，绝不能率意而为。比如三公，乃是君主治国之辅弼，其要在于匡扶社稷、宣化四方，若非天下俊德和当世良才，就不得选而用之。从另一方面来看，三公身居其位也不应该再插手祭祀、礼仪之类的琐细事，而要交给相应的官员。如果居高位者总是操心于琐碎之事，就会使下属懈怠，也就难以成就大事。

如何才能辨别人之贤愚呢？陆景认为需要进行一番“推事实效”的工作。他指出，“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料即评估，覈即查验，也就是对人才的优劣予以勘察。在陆景看来，凡是人之才能，都有长短高下之别，明君需要裁而用之，尽量“任得其才、才堪其任”，使职位与能力相匹配。凡是用人而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都是任人而不能尽其才的缘故。古圣贤王还通过奖赏、刑罚，“验之以实，效之以事，能推事实效，则贤愚明而治道清矣”。意思是说要考核人才之名实是否相符，既要循名责实，也要察言观效，即一方面要知道才有偏达，以便量才授用；另一方面要循其本性，才须堪其任方行。如此则能辨别贤愚，使治道清明。

（三）

对于君王而言，因为长期久处深宫，眼不得亲见臣下的得失，耳不得亲闻贤愚的评论，要想使治道清明，在敬贤诛恶之外，还必须君臣一体，上下同心。一方面，人主通过“立辅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劝之以爵赏，诫之以刑罚。故明诚以效其功，考绩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优者任重”，并以此全面了解人才之优劣，广行政教，佐以治道；另一方面，“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官不虚设，人不疑用，选官用人务求精当，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就信而不疑。

按照陆景的观点，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如身、手一般，互相信任，“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进言之，天子能听臣下之劝谏而改容纠偏，是因为重视臣下；而臣下之所以愿尽职于君上，则是为了报人主知人善任之德。这既是自古以来理想的君臣关系，也是现实中需要不断致力以期实现的一个目标。苟能上下同心以治世事，就会不待命而勉励有为，进退以礼，功成而世治。

在《典语》最后，陆景提出治国者应该施行恤民之道，这也是君臣上下同心以治世的必然要求。就其大者而言，人主在“综理四海，收养品庶”之时，要认识到“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无此三者，则天子魁然独在，无所为尊者也”。赖由民力、民财、民众，才有了人主之尊，才有了国家的正常运行，所以明主贤君必然会心生惻隐，行不忍人之政，通过博爱、恕道，尽力满足民众的正当要求。陆景认为，容身之所、匹配之偶、充饥之粮、御寒之衣，此四者乃是“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明主治世，必定会恕下以身，与民同乐。这多少是一种与孟子的“仁政”颇为相似的思想主张，在陆景看来，如果人主能仁惠广治，就会万方归化，国祚绵长。

总的来说，陆景在这本书中集中地提出了自己的治道观，除此之外还谈及了随时改制的通变思想以及昭德知功的重爵思想，有着鲜明的儒家特质，尤其是强调治国理政要广修文德、播其德教，更是有着恒常不变的价值意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智慧光芒。

历史文化



典籍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

□ 荆晓燕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这句诗出自清代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一）。龚自珍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尤以作于1839年的《己亥杂诗》闻名。183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前夜。1839年，对于龚自珍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辞官回乡，从北京到杭州，南下北上，往返两次，行程近9000里，写下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面对清王朝日薄西山、内忧外患的局面，龚自珍“颓波难挽挽颓心”，通过诗歌热切呼唤社会的革新之风和士人的进取之心。《己亥杂诗》共315首，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可以

说，他的文字化作“春泥”，他的思想化为“风雷”，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意为如果不能把握住自己的方寸之心，又岂能应对好广阔无垠的外部世界？重视修心，不是龚自珍的一家之见，而是儒家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是连接“内圣”与“外王”的关键枢纽，而修身的基础是“先正其心”。的确，“寸心”虽小，但却主宰着人的行为，正如明代学者吕坤所言“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因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

难”。那究竟应该如何涵养自己的内心呢？首先，静定以观心，静思以明心。

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因为它懂得沉淀；心的通透，并非因为它没有杂念，而是因为它懂得取舍。万物静观皆自得，人生宁静方致远。人在静定的时候，才会向内观照，才会在纷纷扰扰的世界中去体悟自己的内心。要保证心不在繁华喧嚣的世界中迷失，就要保持它的澄澈静定，这是修心的前提和基础。自省以洗心，自察以净心。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在现实世界中，人难免会受到各种欲望的诱惑和蒙蔽而产生各种私心杂念，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曾国藩号“涤生”，就是取“涤其旧染之污”之意。理学名家倭仁教给他一个修心的方法，就是通过写日记这种方式来加强反省和自察。曾国藩终生奉行，“每

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坚持记录每日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自我坦诚对话，时时反思，日日精进，终成一代名臣。向善以正心，向上以强心。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的发端，一个人只有不断扩充和培养自己的善端，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修养境界。这就需要“立志”，因为只有“志气已定”，才能“不动于心”，才能心游万物而非心役于物。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古代士人的志向和使命。“立志”之后，还需要“力行”，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身体力行，才能使道德上的自觉转化为行动上的自觉。

（上接1版头条）另一方面，把专项整治同检视整改有机结合起来，精准把握政策，不搞层层加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在整改整治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盲目追求数量，及早纠偏各种形式主义倾向，坚决防止出现整改整治上的“半拉子”工程，完成一个、销号一个，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以真查实改赢得群众的认可。

下决心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评判主题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认真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乡村振兴、便民服务、食品安全、社会治安、金融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列第一批民生项目清单37个，以“清单制+责任制+限时制”的方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解决民生问题，推动我省第一批参加单位开列为民办实事清单1645件、办结1100多件。学习践行“浦江经验”，让领导多下去、群众少上来，从源头上减少群众信访问题，全省信访案件持续下降。

检视自己扑下身子抓落实没有，坚决克服学用脱节两张皮

重实践、建新功，落脚点在“干”字上，不能学归学干归干，要教育实践两手抓、两促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在以学促

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群众看主题教育搞得好不好，不是看我们说了什么、说了多少，而是看做了多少、效果在哪里。我们坚持以主题教育促真抓实干，教育激励党员干部多干难题、促发展的实事，多办惠民生、解民忧的好事，最终以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云南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关期，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一体推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这一发展产业的思路和方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重要指示要求的实践成果，是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云南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和打造综合优势的重要途径。通过大力发展“三大经济”，以资源换产业，以园区聚产业，以口岸推动产业融入大循环双循环，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2年以来，通过大抓产业，云南过去主要依靠基建、房地产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方式，正在转向产业投资拉动，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扎实推进系列三年行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先后谋划实施了中老铁路沿线开发等38个三年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的“施工图”变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和工作计划，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紧紧扭住农民和脱贫人口增收这条主线，扎实开展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7000元以下的脱贫户，计划到2023、2024年底分别实现人均纯收入8500元以下、1万元以下且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动态清零。比如，针对老百姓家门口好学校少、职业院校“办学难”、学生心理健康等问题，制定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抓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首先要从干部的作风、能力抓起。2022年2月，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工作风持续改进，工作效能不断提升，“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成为广大干部的广泛共识，项目工作法、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和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三法三化”成为各级各部门推进工作的重要方法。现在，云南“躺平”的少了，空喊口号的少了，抓落实、干实事的多了。但成效还是阶段性的，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为此，我们召开全省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工作会议，通报表扬了10名优秀县委书记，鼓舞和激励更多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有明显进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取得实质性进展，让群众感受到党的好作风就在身边。

倡导和树立“十种鲜明导向”。正确导向有利于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激励干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省委结合云南实际，提出大力倡导和树立对党忠诚老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静下心来学习思考、当好“施工队长”、扑下身子抓落实、经常下基层、坚持眼睛向外、敢啃

（上接1版二条）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厉行法治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结构的深度调整，意味着思想观念、领导方式、治理方式的深度调整，意味着各级各方面的行为规范和自我约束，实现这些深度调整，需要无私的境界、忘我的情怀、革命的精神。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

来说，在这场深刻革命中，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需要自觉转观念、转方式、转行为，坚持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切实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制约监督，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在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上下足真功夫、练就真本领。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于伟大的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

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必将继续开创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稳固的法治保障。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研究局局长）